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海上风云

辛亥革命在上海

廖大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海上风云

辛亥革命在上海

廖大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风云:辛亥革命在上海/廖大伟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辛亥革命全景录/金冲及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10164 - 7

I. ①海… II. ①廖…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上海
市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037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技术编辑 伍贻晴

· 辛亥革命全景录 ·

金冲及 主编

海上风云

——辛亥革命在上海

廖大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58,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164 - 7/K · 1799

定价 38.00 元

总 序

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林伯渠同志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同志还谈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

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很不足，危机意识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状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时的清政府已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

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显然这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的权力。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没有能送达朝廷。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空前活跃，

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要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件事不能小看。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第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第二，它没有广泛地发动并依靠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而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促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

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10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众所公认的突出成绩。但有一个问题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这在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时都需要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数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很容易有简单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现出这场革命的全貌，也难以看清这场革命在整个中国造成怎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分省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比较。这部丛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中国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丛书各卷分别对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哪些社会力量发动了当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应对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会变化、旧社会势力怎样反扑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从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对这场革命共同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作这种比较，既难更深入地把握住这场革命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看到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这项工作对推进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

但是，要进行这样全国性的大协作谈何容易。我很钦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下决心齐心合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组织出版的这套《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在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其中，《共和大业——聚焦1911》作为综合卷，总述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地方卷几乎每省一册（《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两市一省）。这样，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发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广西、福建和东北）。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学资料外，作者还亲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了较多新的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进！

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代序)*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有关方面组织编写《辛亥革命全景录》,由各地相关学者分头编写辛亥革命在各地的表现,上海部分由廖大伟教授负责。大伟是复旦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作为优秀人才调入东华大学,担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从事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多年,有《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等多种论著,成果丰硕,由他负责此书的编写,是相当合适的人选。这本《海上风云——辛亥革命在上海》完稿以后,大伟嘱我作序。我将全书细读一过,深感此书相当不错,资料翔实,脉络清晰,分析细致,立论允当,征引规范,既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也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加上文字生动,图片精美,让人读后,丰富了关于辛亥革命的知识,也加深了对上海近代历史的了解。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优秀历史读物,专业学者可以从中看到丰赡的史料与过人的见识,非专业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世纪以前上海复杂奇特的政治场景,波谲云诡的时局变幻,呼风唤雨的政坛群星,纵横捭阖的斗争伎俩,以及多姿多彩的上海社会,进而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革命有比较感性的了解。

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异乎寻常。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先是湖南、陕西、江西响应,宣告独立,随后山西、云南跟上,再后是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等省群起独立,清政府随之土崩瓦解。革命风潮来势之猛,清廷统治覆灭之速,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考其原因,列强侵略、专制腐败,天下苦清已久、恨清已深、

*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此前以《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题,作一短文,发表在《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现略作修改,以为廖大伟教授《海上风云——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的序言。

反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都是显而易见者。在这一划时代的革命史上,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起义队伍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方式、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对于遗老的接纳,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在全国的地位极为特殊,作用极为重要,影响极为深远。

一、舆论基地

辛亥革命的成功靠两条:一是武力暴动,一是舆论宣传。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地位非常重要,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清末进行反清革命宣传的地方主要有三:在海外是东京与南洋,在国内则是上海。在东京有《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河南》、《洞庭波》,在新加坡有《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在马来西亚有《槟城日报》、《光华日报》。由于治外法权的因素,上海租界成为清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地方。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先后有《苏报》、《国民日报》、《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十多种。东京、南洋的革命报刊虽然很激烈,但离中国本土较远,对中国本土的影响远不能与上海相比。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革命书刊的传播,但上海租界就在中国本土,且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那些流传到内地的革命书刊的煽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是1899年阅读了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卢梭的《民约通义》,此书是1898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版、同年在长沙出售的。邹容的《革命军》是在上海出版的,1903年“苏报案”以后虽然遭到查禁,但越禁越热销,不到十年间,先后被摹印二十多版,行销一百一十多万册。

上海的革命报刊之所以能持续出版,关键在于租界的存在。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实行中立开始,上海租界逐渐变成中国治安版图上的孤岛,清政府无法在政治上对这里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清廷官员、军队不能随便经过,华捕不能随便入内抓人。1862年,被怀疑与太平军私通款曲的王韬,遭到清政府通缉,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避地香港的。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是从反对清政府角度看,这恰恰是在清

朝专制的铁板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出现了一块大一统专制统治的薄弱地带。维新派、革命派都看到了上海租界的这一特点,并且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1898年戊戌政变后,维新领袖康有为借上海租界这一特点,躲过了清廷镇压,逃到香港,后来逃到外国。维新派重要成员黄遵宪也是利用租界这一特点,得以活命的。1900年,寓沪士绅经元善等一千多人公开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清廷下令追查,经元善利用租界特殊的环境,逃到了澳门。唐才常等两次公开在愚园举行反对清朝专制的“中国国会”,公开宣言反对慈禧太后的统治,也是利用了上海租界的特点。从19世纪50年代,到1900年,经过五十来年的演变,上海租界的特质早已为朝廷上下、国内国际所共知。20世纪初年,革命派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上海经营成革命舆论宣传基地,组织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经常在张园集会演说,将《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办成革命喉舌。尽管在1903年“苏报案”以后,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国革命舆论基地。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在《民呼日报》遭到禁止以后,续办《民吁日报》,“吁”与“呼”只差两点。《民吁日报》遭禁后,再办《民立报》。这种魔术般的变换,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应付租界当局,还不如说是租界当局在应付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在国内无处可比。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前线战况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民军的喉舌。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向人民介绍革命党的政策,说明革命党人人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革命党在湖北起义以后,武汉三镇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民立报》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的影响。

由于革命报刊的影响,上海社会在武昌起义以后,舆论一边倒,赞成革命。《民立报》馆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每天各方人士往来不绝:

当时上海各报馆均设于望平街一带,每晚出号外,报道当日消息,并在报馆门口张贴。市民群众每日聚集在报馆门外,探听消息,人山人海,万头

攒动。见有民军胜利消息，都拍手欢呼，见有失利消息，则认为报馆采访有误，群情愤激，甚至将报馆玻璃窗打破。后来报馆方面停止在门口张贴军事消息，仅印发号外数种，市民踊跃争购，每日供不应求，片刻即罄，可见人心之一斑。^①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二、两派联手

清末，不满清朝专制统治的，除了革命派，还有立宪派。在日本与南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曾展开论战，在湖南等地也有类似情况。上海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既是革命派活动的基地，也是立宪派的大本营。立宪派两个著名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和政闻社的本部都先后设在这里，两派在上海的关系，为友好团体，有意见分歧，也相互支持，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黄炎培是同盟会会员，也是立宪团体的会员。张謇、马相伯、赵凤昌等立宪派骨干，都是黄炎培好友。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立宪派首领马相伯为莫逆交，于右任与马相伯是复旦校友，关系非同一般。革命派办《神州日报》，曾得到张謇与马相伯的资助。1908年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陈陶遗被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出面营救，张謇找了端方，结果端方未敢杀陈。1909年革命派的《民呼日报》遭到封禁，立宪派主持的《时报》和《东方杂志》均为其打抱不平，批评政府压制舆论。革命派对立宪派的有些主张，亦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张謇等人在1909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民吁日报》称他为伟大人物，《民立报》称请愿代表为“志士”。立宪派真诚希望中国实行宪政，废弃专制，以便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清朝统治者对他们始则哄骗，继而拖延，终则镇压，这就不断地加大他们对朝廷的离心力。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立宪派很快与革命派合流，这与两派的历史渊源有很大关系。革命派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立宪派在工商界渊源较深，两派结成统一战线，扩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减少了反清势力的内耗，对于上海起义的成功，有重要意义。

^① 方椒伯：《上海工商界在光复前后的动态》，《辛亥革命文史资料纪念专刊》，第220页。

三、特殊风格

上海不是虎踞龙盘式的军事要隘,城墙至清末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全无军事防卫的意义。从城市区域分布上来说,清末的上海由四块构成,南市(包括城厢内外)、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其中南市、闸北属清政府管辖,但两租界横亘其间,呈夹心饼干状,这更增添了管辖和防卫的复杂性。从城市功能上看,自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以后,上海的重心,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商业、工业、金融等)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移到了租界,而租界并不在清政府直接控制之下。从人口分布看,至1910年,两租界的人口已占上海总人口的48%,如果加上广大的越界筑路地区,则租界实际人口已超过一半。这就是说,在清末,上海城市的主要部分已经不在清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象征清政府统治的苏松太道和上海知县的衙门设在县城,但这种衙门在晚清上海,并不像在其他城市那样是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其外交意义、海关意义大于行政意义。

这种格局,使得租界在上海政治力量对比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租界偏向哪一边,哪一边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在小刀会事件中,租界当局先是中立,小刀会与清廷就处于对峙状态。后来,租界当局站在清政府一边,清政府就胜了,小刀会就败了。在清末反清革命斗争中,租界当局一般处于中立状态,在辛亥起义中也是如此。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局已据各方面情况判断,革命党人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上海,于是确立了“中立”的方针。起义发动前一天,英国驻沪总领事傅磊斯发出告示,要求租界英人既不参与反对清政府的战争,也不参加镇压革命党人的战争,否则,一经查出,即处500镑以下之罚金,或监禁两年以下。租界当局中立,但是,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并不中立。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多年政治运动的整合,包括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租界华人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李平书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革命党与清政府两极对峙中,得绅商者得天下,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李平书等倒向革命,意味着租界的华人精英倒向革命。

这样,上海在武装起义时,便呈现出其他城市都没有的特点:其一,公开性,在起义以前,已经露出风声,革命党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优势。其二,不战而胜。上海起义在县城、闸北都是传檄而定,兵不血刃,没有什么激烈的交锋。上海起义发动以后,社会秩序相当稳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民军占领城厢时,南市新舞台演戏如常,观众看戏亦如常,似不知本城有变者。伶界商团部分团员,在演完夜戏后,便去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

四、关键作用

在全国起义过程中,上海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

其一,对于全国起义的组织领导。清末革命据点在国外为东京,国内为上海。到1909、1910年,由于多种原因,东京同盟会总部对革命的领导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同盟会的领导,而孙中山等人此前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两广、云南边境,对长江流域注意不够。于是,建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统一机构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提了出来。1911年7月31日,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领导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有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章梓、范鸿仙、谭人凤等33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及《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两天后再举行会议,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会后,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相继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联络组织,运动新军,策划起义。同盟会中部总会总部设在上海,是革命党人利用了上海特殊的地位。正是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正确部署,才在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其二,上海起义意义重大。上海是晚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商业者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云南等省起义成功,主要依靠新军,而上海则主要依靠商团,依靠工商业者。工商业者积极支持、参加反清革命,上海最为突出,这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沈缙云是信成银行经理,叶惠钧是上海粮食业巨商,李平书是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诸人都是上海起义的骨干。

上海是国际上著名的通商巨埠,向为中外瞩目。上海起义成功,租界当局采取中立政策,这对于正在与清军作战的武昌民军,对于纷起的各地起义,都是巨大的鼓舞。上海又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它的起义成功,不但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往湖北清军,而且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削弱清军具有直接的影响。上海是长江门户,它的起义成功,直接阻止了清廷海军西援,减轻了武昌民军的压力。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起义,引起了江浙的连锁起义。苏州、杭州的独立,南京的光复,都与上海有直接关系。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江浙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

对于上海起义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①。陈其美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这段话虽然有孙中山对于陈其美极端器重的感情色彩,但也说出了上海在辛亥革命格局中的独特作用。

其三,革命政权的经济支柱。起义成功以后,维持军队生存、维持政权运作,都需要巨额经费,上海工商业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平书曾向江苏、浙江、扬州、镇江、山东、安徽、湖北等各路民军,发给每人7天伙食费一元,共发一千多元。上海起义后军警费用,均由李平书筹措。沈缙云为革命政权贷款三十多万两。富商朱葆三在继沈缙云担任财政总长以后,为新政权向上海商人借款十万五千两白银,向日本三井洋行借银三十万两。上海商界为新政权提供大量的捐款和税收。

其四,南北议和的理想地点。1911年11月底,清军攻陷汉阳,武汉军政府处于不利地位。已经占据上风的袁世凯提议南北议和,即南方革命军与北方清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中山选集》,第208页。